东南亚华文报刊的世纪历程

周中坚

东南亚华文报刊个别萌芽于19世纪前期，部分诞生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开始形成群体并开始其主要的历史进程。在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历史的发展，东南亚华文报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到相继取得国家独立并开始实现国家现代化，东南亚华文报刊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华侨喉舌到华人桥梁的演变，经历了从植根于祖国中国到移根于所在国的变化。这个过程同华侨变为华人，同华侨“落叶归根”到华人“落地生根”的变化是一致的。

一、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出现

在东南亚由华侨自己创办、作为华侨喉舌的华文报刊出现之前，19世纪前期东南亚已经出现了由西方人创办的华文报刊。这些报刊多半是杂志，形式比较简单，内容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目的是为西方殖民统治服务。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于马六甲。创刊号声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因为“神至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除宣传基督教义外，也刊登一些世界新闻和科学知识。为了迎合华人的传统思想，还常引用孔子的一些言论。1821年停刊。^①

《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1822年米怜病故，1824年其同事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到巴达维亚创办此刊，1826年停刊。^②

《天下新闻》1828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次年停刊。主编为该院华文教授、英国学者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英华书院是英国人1818年创办的华人英文学校，1843年迁往香港，其学生毕业后任英国殖民当局的官员、译员或从事商业活动。^③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年英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1837年迁往新加坡出版，同年停刊。宣传基督教教义，同时报道政治、科学、商业新闻。^④

《日升报》创刊于1858年以前，由英国人汤·威·史密斯创办于新加坡。^⑤

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华侨自己创办的主要服务于华侨群体的东南亚华文报刊开始出现。最早问世并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新加坡的《叻报》。

《叻报》1881年由福建华侨薛有礼创办，由叶季允任主笔，1932年停刊。《叻报》刊载清朝谕旨和公文奏折；除当地新闻外，多转载上海香港电讯；既反映国内情况，也反映当地

华侨生活。主笔叶季允在副刊上每日发表《粤讴》一篇，抨击华人赌博、械斗、吸鸦片等陋习。《叻报》虽然倾向保守，但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叶季允曾在该报《新年吉语》中大声疾呼“既当创深痛巨之余，同作卧薪尝胆之想”，认为中国“抚二万里膏腴之地，有四百兆灵秀之民”，物产“为五大洲富饶之冠，苟使农工路矿，有利皆兴”，则全国必将“无家不给”，通过“益坚民志”，图强有道，就可以“弭患于无形”。^⑥爱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岷埠华报》菲律宾最早的华文报纸，1888年由杨汇溪创办，深得侨社好评。一年多后改名《岷报》，又数月后因经济困难停刊。^⑦

《星报》1890年由林光铨创刊于新加坡，1898年因经济支绌停刊。《星报》是中国保守派的舆论工具，反对华人学习西方文化，宣称“不留辫子就不是中国人”，刊登鸦片烟枪广告。^⑧

《槟城新报》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报纸，1896年由林华谦创办，为保皇党人在槟榔屿的机关报。1936年并入《光华日报》。^⑨

《天南新报》1898年由邱菽园创办于新加坡，1905年停刊。拥护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是新加坡保皇会之机关报。^⑩

《日新报》《星报》停刊后，由林文庆接办，1899年改称《日新报》出版，1901年因经济困难停刊。该报一反《星报》保守立场，改革内容，拥护维新变法，增加国际新闻及西方科学技术报道。^⑪

《益友新报》1899年由潘庶蕃创办于马尼拉，一年多以后停刊。鼓吹通过君主立宪拯救国家危亡，是马尼拉保皇会之机关报。^⑫

综观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东南亚早期华文报刊，它们一开始就同祖国的命运和华侨的利益紧紧相连，反映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华侨心声。同国内一样，维新改良思想占上风；戊戌变法失败后，保皇和君主立宪思想仍为当时舆论的主流。当时的东南亚华文报刊“记录清廷谕旨公文”，并“略载时事新闻”。^⑬由于民智未开，发行量少，入不敷出，多数东南亚早期华人报刊诞生不久即相继停刊。

二、东南亚华侨的喉舌

(20世纪初至50年代)

20世纪初至5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南亚华文报刊充分地发挥了华侨喉舌的历史作用，为祖国的命运而呼唤，为祖国的前途而抗争。

(一) 革命的号召：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崛起 (20世纪初至20年代)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反清起义此伏彼起。孙中山先生和众多革命志士先后奔赴南洋，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筹募革命款项。在革命春雨的滋润下，东南亚华文革命报刊如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从1904年到1911年的七年之间，东南亚各地爱国华侨创办的革命报刊达20多种^⑭。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加坡的《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

《图南日报》1904年由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于新加坡，系中国同盟会报纸，“为南洋党报之元祖”。^⑮1905年元旦，《图南日报》印制月份牌分赠华侨，上题对联与诗句，对联云：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诗后二句阐发了“图南”二字的深意。同年华侨冯夏威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自杀抗议美国排斥华工，《图南日报》立即在新加坡召开追悼会，提高了华侨的爱国觉悟并推动了南洋各地的抵制美货运动。孙中山先生十分满意《图南日报》的革命倾向，1905年6月从欧洲东归、舟过新加坡时，特约见该报人士。革命党人尤列带领陈楚楠、张永福等登轮晋谒孙中山，共同商讨在南洋成立党政机关事宜。^⑮

《仰光新报》1904年由庄银安创办于仰光，1906年停刊。1905年，该报连载革命党人秦力生所著《革命箴言》，全文六七万言，分24章，内容类似邹容《革命军》而更重于言理，“稿中诘驳康党之处甚多，可一惩其顽焰”。“登出后，全缅侨众读之，尤为感奋”。因此遭报中保皇派反对，仅能刊至16章而止。^⑯

《南洋总汇报》1906年《图南日报》停刊后，陈楚楠、张永福继而创办《南洋总汇报》。报面不用大青年号，直呼清帝光绪为载湉。其后报权落入保皇派手中。^⑰

《华暹新报》1907年由陈景华、萧佛成创刊于曼谷。该报声称取名华暹新报，目的是向暹罗读者介绍中国消息。萧佛成发表《中国的统治制度》一文说，革命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推翻满族的统治，这也是所有中国人要为之努力的事业，因为中国满族的政府没落腐朽，治国无力，卖国求荣。^⑱《华暹新报》与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互相呼应，鼓吹革命。1942年日军入侵暹罗后被迫停刊。^⑲

《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报》落入保皇派手中改变宗旨后，1907年由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创刊于新加坡，为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报，也是辛亥革命时期东南亚力量最雄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革命党人胡汉民为之撰发刊词，表达了《中兴日报》之爱国革命主张，“以爱国爱种为唯一揭橥”；他专门论述了革命派与保皇派对于“平和”与“激烈”的不同理解，认为革命者绝不接受外国占领下和他族统治下的“平和”。^⑳同年孙中山先生亦托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驳斥“革命足以召瓜分”论。革命党著名人士汪精卫、居正、陶成章等经常为该报撰稿。革命派以《中兴日报》为阵地，与保皇派掌权后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论战，“其争辩之剧，殊不让香港中国报与商报之激战”。1910年《中兴日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㉑

《光华时报》1908年缅甸同盟会成立，同年由会长庄银安等创办《光华时报》于仰光。杨秋帆、居正、吕志伊（天民）等任总主笔，“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的保皇立宪主张，登载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1909年被清朝驻仰光领事下令停刊，同年12月复刊，声势益张；1910年又遭到迫害停刊。庄银安避地槟榔屿，同年10月复刊于其地，大声疾呼革命，影响广远。是时南洋革命党人之大本营已由新加坡移至槟榔屿，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络绎来到槟榔屿，举行准备黄花岗起义的同盟会军务会议。《光华时报》的地位与前三年的《中兴日报》相同，前后辉映，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㉒

《南侨日报》1910年同盟会会员黄吉辰、卢耀堂创刊于新加坡，为《中兴日报》之继续。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后，革命怒潮澎湃海外，《南侨日报》的革命报道与言论大受南洋侨胞欢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南侨日报》跟踪报道，使革命成功讯息迅速传遍南洋。^㉓

辛亥革命期间东南亚的华文革命报刊，著名的还有新加坡的《星洲晨报》，缅甸仰光的

《进化报》、菲律宾马尼拉的《公理报》、印尼的《民铎报》、《泗滨日报》、《吧城日报》、《苏门答腊报》等^②，共同组成了强有力的华侨革命喉舌阵营。

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华文报刊，除了革命派报刊以外，还有保皇派和中立派报刊。著名的保皇派报刊有新加坡的《天南日报》、后期的《南洋总汇报》、仰光的《商务报》等，拥戴光绪皇帝，主张君主立宪，在维持清朝统治前提下“变法救国”；反对革命，认为革命将导致“灭种亡国”，后来又宣扬“借保皇而行革命”，^③同革命派报刊展开关于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保皇言论开始时十分得势，随后逐渐理屈词穷，有的豁然觉悟转向革命，如庄银安初为仰光保皇会会长，所创办的《仰光新报》初亦倾向康梁，后受革命思潮影响，庄银安宣布脱离保皇会，1908年被推为缅甸同盟会会长。《仰光新报》亦发表秦力生《革命笈言》，转向革命道路。1908年以后，其余报刊的保皇言论也自行销声匿迹，因为这一年康梁纠集南洋保皇党徒上书清廷请开议会反遭通缉，他们拥戴的光绪皇帝也在同年死去。^④

辛亥革命后直至20年代，中国仍然由北洋军阀统治，处在黑暗之中，革命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宣传与号召革命仍是东南亚华文报刊的主流。如1921年创办于巴达维亚并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报名的《天声日报》，因宣传三民主义，坚守民族立场，言词激烈，曾有两位社长和10多名主笔、编辑被荷印殖民者驱逐出境。^⑤

（二）抗日的呼唤：东南亚华文报刊的繁荣（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

抗战期间，作为华侨喉舌的东南亚华文报刊，吹响了抗日救亡和抗日战争的嘹亮号角，推动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在抗日救国的热潮中，东南亚华文报刊肩负时代使命应运而生，进入了东南亚华文报刊史上的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至40年代初，东南亚华文报纸有五六十种。^⑥在抗日救国运动最为活跃的新加坡、马来亚，30年代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总汇新报》、《星中日报》、《马华日报》、《中华晨报》、《光华日报》、《槟城新报》、《现代日报》、《星洲日报》等华文报纸，还有《南洋周刊》、《文艺长城》、《青年月刊》、《人生周刊》、《现代周刊》、《胜利半月刊》、《南潮月刊》、《文艺丛报》、《星洲期刊》、《学习青年》、《热带文艺》等刊物。^⑦在泰国，有《曼谷日报》、《国民日报》、《新时报》、《中国报》、《华侨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日报》、《民国日报》等报刊。在越南，有《全民时报》及其后继者《华商日报》等报刊。在菲律宾，有《华侨商报》、《新闻日报》、《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民族斗争》等报刊。^⑧这些报刊连同印尼、缅甸等其余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刊，密切跟踪祖国抗日战争的每一步进程，通过发新闻、刊社论、登图片、出号外，一致发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呼唤。

1923年由陈嘉庚创办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1929年由胡文虎创办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及时而充分地反映了创报者和广大侨胞的爱国思想和抗日言行，在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南侨总会成立以后，《南洋商报》事实上成了南侨总会的机关报。当时《南洋商报》等华文报刊大量报道南洋各地筹赈消息，如1939年12月份的《星洲日报》早报，每天的《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各版中，捐输的消息都占2/3以上的篇幅，甚至囊括全版。^⑨1940年巴达维亚《天星日报》发动“伤兵之友”运动，数日内募得2万余元汇回重庆。^⑩

1938年由张天、陈炳权等创办的越南堤岸的《全民日报》，是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的

机关报。在印支华侨爱国抗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在南越拥有众多订户外，还远销越中、越北以及柬埔寨、老挝等地，成为当时印支最大的华侨报纸。^⑤1938年创刊于越南堤岸的另一份华文抗日报纸《越南日报》，也在印支华侨中享有很高声誉。^⑥

东南亚华文报刊在大量报道国内抗日讯息的同时，还注意介绍国内随抗日而兴的新气象。1935年9月，《星洲日报》创刊六周年，特出纪念专刊《新广西》。胡文虎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说：“广西在现代中国各省区中，号称最贫最小，然其负责当局，推诚合作，埋头苦干，庶政毕举，百废俱兴，治安最良，秩序最好，卓然有模范省之誉”。^⑦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同国内的联系，借助国内人才优势壮大自己在抗日救国事业中的份量，东南亚华文报纸纷纷从国内延请杰出人才担任编辑。1940年12月，《南洋商报》聘请胡愈之担任编辑主任，随后《星洲日报》、檳城《现代日报》等竞相仿效。在胡愈之和报社同仁的努力下，《南洋商报》一跃而为“南洋侨报之首”，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⑧

（三）光明的追求：东南亚华文报刊的鼎盛期（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被封禁的华文报刊纷纷复刊，新的华文报刊又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战后至50年代，东南亚出版过的华文报刊约有一百多种，^⑨进入了东南亚华文报刊的鼎盛时期。其原因是：

（1）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南亚华侨经受了锻炼，他们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积极投入当地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组织加强，思想提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战胜利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迫切希望祖国在战后走向和平、民主和富强。这是战后东南亚华文报刊趋于鼎盛的深厚土壤。

（2）战后东南亚各国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当地华侨积极参加斗争，斗争也促进了当地华文报刊的发展。

（3）西方殖民者战后卷土重来，但他们的殖民统治基础毕竟已经动摇，统治力量已经削弱，这就为华文报刊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4）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刚刚相继取得独立，虽然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正在滋长，但其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威胁华文报刊生存的程度，华文报刊还有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这个时期，东南亚华文报刊作为华侨喉舌，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追求祖国的和平，追求祖国的民主，追求祖国的进步，一句话，追求祖国的光明未来。1946年11月21日创刊的新加坡《南侨时报》，创刊号上发表创办人陈嘉庚《告读者》一文，阐明该报宗旨是：“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⑩这段话正代表了战后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共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西贡为中心的越南南方，《越南日报》、《中华日报》、《远东日报》等纷纷复刊，《时代报》、《南亚日报》、《全国周刊》、《青年周刊》、《妇女周刊》等新报刊纷纷出版；50年代，仅西贡就有30多种华文报刊。在越南北方，战后河内出版了《青年报》、《太平洋日报》、《太平洋周刊》、《青年报》，海防出版了《刚锋日报》、《中山日报》、《商讯日报》，也曾极一时之盛。战后复刊的《越南日报》支持祖国的和平民主事业，揭露接收南越的英印军烧杀掠夺堤岸华侨的罪行，报导了受害群众抗议英印军的示威游行。《远东日报》创刊于1940年3月，1941年6月日军登陆越南后停版，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复刊，发行量达1万多份，销路遍及印支三国，是全越南最大的一家华文报纸。^⑪

50年代，柬埔寨有《棉华日报》、《工商报》、《生活午报》、《湄江报》和《环球日报》等5家华文报纸，总发行量约2万份，其中《棉华日报》发行量曾高达11000份，是柬埔寨华文报刊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棉华日报》团结柬埔寨华侨，支持祖国建设，主张中柬友好，在华侨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很大的号召力。^④

1946~1957年间，印尼华文报刊也在顺利发展。据1957年统计，印尼有华文报纸18家。^⑤

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国内国共两党的斗争波及东南亚华侨社会，东南亚华文报刊也划分成国共两大系统，出现了继辛亥革命前革命与保皇两派对垒之后的第二次分立——国共分立。以印尼华文报刊为例，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有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觉醒周刊》、泗水的《大公商报》、坤甸的《黎明日报》、棉兰的《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等等；而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有雅加达的《天声日报》、《中华商报》、《自由报》、泗水的《青光日报》、坤甸的《诚报》、棉兰的《兴中日报》、《新中华报》等。^⑥其余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刊也大抵如此。如50年代只有5家华文报纸的柬埔寨，其中《环球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棉华日报》等4家则站在共产党的立场。^⑦上述情况说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华文报刊还是同国内形势发展紧紧相连。

三、低潮与过渡

(20世纪60—70年代)

20世纪60—70年代是东南亚华文报刊步入低潮并从华侨喉舌向华人桥梁转变的时期。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了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觉醒，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东南亚国家先后摆脱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当地的主体民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狭隘民族主义开始在统治民族中滋生，他们把经济上十分活跃并同祖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华侨华人视为异己分子和敌对势力，作为限制、排斥的对象。

第二、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和意识形态冲突，使中国成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统治者心目中的敌人。

第三、随着时代的变化，东南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而华侨华人传统的以中国为祖国的观念同新形势已格格不入，势必要发生碰撞与冲突，其政治地位势必要被边缘化。

东南亚各国国情不同，对待华侨华人的政策不同，华侨华人的境遇亦不一样。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融入当地社会，华文报刊能够不间断地存在和发展，自我调节，和平过渡，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同，特别是印尼和印支国家，华侨华人面临十分困难的境遇，华文报刊同华文教育、华人社团一起，作为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受到空前的打压。

(一) 从印尼到印支：华文报刊遭到封禁

封禁华文报刊首先是从50年代末的印尼开始的。1958年4月17日，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以陆军中央战时掌权者名义，颁布矛头指向华文报刊的禁令：为了防止“损害国家利益及公共治安秩序”，“禁止使用非拉丁字母、非阿拉伯字母、或是非印尼地方字母印刷、出版、公布、传递、散发、买卖以及（或是）张贴出版的日报或杂志”，违者处以一年监禁或一万盾的罚款。^⑧结果印尼全国所有25家华文报刊全部被迫停刊。同年5月23日，纳苏蒂安

发布修正令，由于政府“需要宣传工具”以“动员社会一切阶层拥护政府”，而“一部分社会阶层”只懂得华文，因此同意华文报刊经批准后复刊。同年11月29日，准许11家华文报刊复刊，但又规定“根据治安上的考虑”，随时可以再次封禁。^⑦

1959~1960年，印尼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浪潮。1960年7月，西瓜哇芝马圩军警迫迁华侨并打死华侨妇女杨木妹、叶金娘，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报道和追悼殉难侨胞的文章；12月，印尼当局下令关闭全部华文报刊。1965年“9·30”事件后，连半官方的华文报纸也遭悉数封禁。

1964年，缅甸禁止外侨出版发行报刊，华文报刊被迫停刊。

50年代后期起，同中国保护良好官方关系的柬埔寨也出现排华逆流。1967年9月13日，柬埔寨当局下令关闭全柬华文报刊。

60年代，北越仅剩《新越海报》一家半官办华文报纸，南越除原有的报刊以外，又陆续出版了不少新的华文报刊，如1960年创办的《新越晚报》；1961年创办的《成功日报》；1962年创办的《国际报》、《越南新报》、《国民时报》；1963年创办的《建国时报》；1964年创办的《越南快报》；1966年至1972年又新出版《新生晚报》、《光华日报》、《海光日报》、《胜利报》和《人人日报》。由于停刊或合并，到1975年西贡解放之前，西贡还剩下9家华文报刊。

（二）官办华文报刊：华文报刊的变种

那些把华文报刊全部取缔的东南亚国家，其统治者很快认识到：有必要出版官办华文报刊，作为控制和同化华人的工具。于是由政府出面创办、并在政府监管下出版的华文报刊出现了。开始时是半官办形式，最后办成全官办华文报刊。半官办与全官办并没有本质上差别，只在于控制程度略有不同，半官办更多地通过入籍华人代理操作具体编辑出版事务，全官办则由官方及其代理人直接控制。

印尼出版过数量最多的过渡性的半官办华文报刊。从1958年第一次下令关闭全部华文报刊，到1966年出版全官办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8年间先后出版过多种半官办华文报刊。1961年1月，在印尼军方监督下，先后在棉兰和雅加达出版华文《政治宣言日报》，规定用1/4版面刊载印尼文字；同时在泗水出版华文《红白报》，规定华文和印尼文各占一半篇幅。1962年这两家华文报遭封闭。随着1959~1960年排华浪潮逐渐平息和印（尼）中关系逐步好转，1963年4月印尼当局解除戒严令，准许复办华文报刊，但不是准许传统华文报刊的复刊，而是创办由印尼当局控制的半官办华文报刊。印尼当局规定，这些华文报刊必须是印尼民族报纸，其任务是“促进爱国情绪并建造印尼的国家”；社长经理必须由印尼人担任，编辑记者也必须是印尼籍公民；报社经费由印尼政党赞助。这类半官办华文报有1963年8年在雅加达出版的《首都日报》，社长为印尼人苏西多；此外还有《火炬报》、《忠诚报》和《革命日报》。1965年“9·30”事件后，这些半官办华文报遭关闭。1966年初，印尼当局又在雅加达、泗水和棉兰分别创办《两项人民命令报》华文版，但不久又自行封禁。^⑧此后印尼剩下的唯一华文报刊为全官办的《印度尼西亚日报》。

《印度尼西亚日报》创办于1966年12月，由印尼政府情报部管辖，由印尼军人主管，编辑人员来自国家情报统筹局、最高检察院和警察部门，新闻需经政府审查，印尼文和华文各占一半版面。这是一份供不谙印尼文的中老年华人阅读的全官办半华文报，创办者的意图是通过报纸宣传贯彻印尼当局的法令和旨意，作为统治华人的宣传工具。当时印尼政府还宣

布，其最终目标是将这份报纸全以印尼文出版。^{⑤1}

越南的官办华文报出现的时间比印尼还早，其第一份官办华文报是河内的《新越华报》。《新越华报》1955年由越南华侨联合总会创办，本来是该会的机关报，1957年改由越南政府主办，开始变成官办华文报。1969年，越南政府对《新越华报》进行大改组并改变其报道方针，使之更忠实地为越南的内外政策服务。《新越华报》1976年停刊。^{⑤2}越南当前唯一的华文报纸是官办的《西贡解放报》，1975年5月5日创办于西贡，这是越共胡志明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华文版，报头上标有“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市党部和人民的言论机关”字样，主要内容来自《解放日报》和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编辑和记者多由越籍华人担任。《西贡解放报》和《印度尼西亚日报》一样，是东南亚典型的官办华文报。

柬埔寨政府1967年取缔全部华文报刊以后，1968年在金边创办官方华报《柬埔寨日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任社长兼总编辑，报头刊着“民族、宗教、王室”，称柬埔寨为“我国”；猛烈抨击美国、南越和国内亲美派；在排版上，改竖排为横排。1970年朗诺上台后，《柬埔寨日报》遭封闭并迅即改组为《柬埔寨救国日报》，转为新政权服务。与此同时，朗诺政府1970年在金边创办另一份华文报《经济日报》，以经济为主要内容。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金边，这些前政权的官办华文报一律停刊。^{⑤3}

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大众报》也是官办华文报刊，创刊于1973年。^{⑤4}

在原来华文报刊被全部取缔的情况下，官办华文报代替了传统华文报的某些功能，填补了原有华文报被封禁后留下的某些空白，使华人能够通过官办华文报了解一些国内外要闻，并从所登广告中了解华人社会的一些情况，如通过“讣告”得知亲朋故旧的讯息和宗亲会的活动（在印尼，侨团被取缔，宗亲会还允许保留），以便参加丧礼，对死者表示哀悼，并趁此机会与亲朋故旧相聚。^{⑤5}

（三）政治中立与意识形态淡化

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除了中立派的报刊以外，东南亚华文报刊政治倾向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当时世界正处在冷战的巅峰时期，两大集团营垒分明。国际冷战与中国内部政治斗争时刻牵动着东南亚的华文报刊。以60年代柬埔寨华文报刊为例，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下，柬埔寨某些华文报刊忘记了自己置身于柬埔寨这一基本事实，几乎同中国国内报刊一样，天天以大篇幅登载“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宣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理论。在他们的狂热鼓动下，大批华校师生离开城市，到“解放区”去支援越共和红色高棉的“伟大反帝斗争”，自认为这是贯彻“国际主义”理想、实现“世界一片红”的革命行动。当时西哈努克下令改组被“极左”分子把持的“柬中友协”，中国外交部中造反派中的“极左”分子以“中柬友协”名义，致电被改组的“柬中友协”“致革命敬礼”，支持他们“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柬埔寨华文报纸转载了这篇“革命电文”。这无异于火上加油，西哈努克和柬埔寨当局久积的愤懑终于爆发，1967年9月13日下令关闭全柬华文报刊。^{⑤6}东南亚华文报刊还有许多类似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偏激而遭封禁的事例。

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劫难，东南亚华文报刊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纷纷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在政治上采取中间温和立场。不论对住在国、对祖籍国，还是对国际事件和形势，力求尊重事实，态度客观，持论平和。马来西亚当前最大的华文报《南洋商报》，1986年在扩版征稿启事中就明确要求来稿者“根据该报中立的编辑方针，供写须淡化政治色彩，

降低文章的政治笔调”。⁹⁰ 90年代冷战结束后，政治中立化和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势更为普遍和明显。40—50年代东南亚华文报刊内部因政见不同而分立对抗的现象也随之成为过去。可以说，这种趋势有利于华文报刊在东南亚长期生存。

四、东南亚华人的多向桥梁

(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华侨相继加入所在国国籍而变成东南亚华人，东南亚华文报刊也开始了从华侨喉舌到华人桥梁的历史性转变过程。60—70年代是转变时期。80年代以后，东南亚华文报刊除了继续表达华人的利益和心声，仍然以大量篇幅报道华人社会的各种活动以外，同时根据历史的新要求，充当华人通向住在国、通向祖籍国和沟通住在国与祖籍国关系的多向桥梁。

(一) 通向住在国的桥梁

当代华文报刊肩负着推动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使命，许多华文报刊提出“本地化”的口号⁹¹，就反映了这种使命感。1999年5月创刊的印尼《呼声》杂志，在创刊号《开场白》一文中申明该刊宗旨：“通过文字去团结教育印尼华裔争取早日成为印尼民族的一员，与印尼其他各族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也通过文字去提高广大印尼华裔的素质，加强印尼各族的团结合作，为印尼各族的生活幸福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这就是本刊的宗旨，也是本刊坚定不移的方向。”其《征稿简约》云：“本刊征求下列稿件：1. 凡是以团结广大印尼华裔及促进印尼华裔和当地印尼各民族的团结合作的文章，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体裁，我们一律欢迎。2. 我们也欢迎对印尼经济动态的评述及对商业信息的报导方面的文章。3. 我们也欢迎有关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的文章，以及有感而发的短小精悍的评论。”⁹²作为印尼局势好转后最早出现的华文报刊之一，《呼声》一创刊就十分明确地把引导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列为办刊的首要任务和刊物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当代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共同趋势。

东南亚华文报刊通向住在国的桥梁作用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 (1) 号召华人忠于住在国，做一个既享权利、又尽义务的公民；
- (2) 号召华人和住在国其他民族消除隔阂，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友好相处；
- (3) 报道住在国的建设成就，号召华人为住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 (4) 号召华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 (5) 报道住在国经济讯息，广拓华人的经济生活门路。

(二) 通向祖籍国的桥梁

海外华人对祖籍国有深厚的感情和割不断的文化联系。尽管他们已加入住在国的国籍，成为住在国的公民，仍然泯灭不了寻根的情结。当代东南亚华文报刊反映了东南亚二千多万华人的感情和愿望，继承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成为东南亚华人，特别是在当地出生长的新一代华人通向祖籍国的宽广桥梁。

1986年10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展开“华文报有前途吗？”的讨论，前国会议员陈德良说：“今天，我们应重视的是一份具有民族文化特性、心理与精神之报纸。”新山律师杨培根说：“办报是搞民族的事业。”又说：“我们要让华裔学生知道华文是我们的母语，是民族

的根，是文化的根，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掌握它，珍惜它。这样，华文报就一定会有接班人。”^⑤这些话说出了广大华人对华文报刊的殷切期望。华文报刊作为通向祖籍国的桥梁，正是植根于如此坚固的基础之上。1993年12月17日创刊的柬埔寨华文报纸《华商日报》，社长方烟祯在创刊献词中提出“以宣扬柬华文化为己任，以促进工商经济为使命，以服务广大读者为职责”的办报方针。^⑥这个方针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弘扬中华文化，既是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共同传统，也是东南亚华文报刊共同的现实和未来指向。

传播华文本身就是华文报刊的重大贡献。华人、特别是新一代华人通过上华文学校、读华文报刊来学习华文。东南亚华文报刊经常举办学习华文、弘扬中华文化的各种活动。如柬埔寨《华商日报》1994年先后举办了青少年书法比赛、华校学生作文比赛、华文译成柬文比赛，还计划今后每3个月举行演讲、查字典、硬书法等项比赛。这些活动受到广大华人的欢迎。^⑦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报刊常年举办的座谈会、比赛等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闻名遐迩。^⑧

（三）沟通住在国与祖籍国的桥梁

历史证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当地华人处境的好坏。东南亚华人直接从东南亚国家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中受益，也因双方关系的恶化而受害。因此，华人殷切盼望并积极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好转，逐渐进入历史上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政治上，中国同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或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双方高层领导互访不断，中国同东盟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建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经济上，中国与东南亚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1997年双方贸易（不含柬埔寨）达250.4亿美元；双方互相投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1997年底，东南亚（不含缅甸、老挝、柬埔寨）对华实际投资已达128亿美元。^⑨文化上，中国与东南亚在教育、科技、体育、文艺、卫生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

在中国与东南亚迅速发展的友好关系中，东南亚华人发挥了桥梁作用，尤其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表现得特别活跃。东南亚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东南亚华人的投资。华文在双方交流中已经成为主要的语言工具与媒介，其地位还在继续提高，作用还在日益扩大。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得到了复兴和发展。东南亚华文报刊积极宣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大量报道中国东南亚友好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讯息。

五、历史的启示与光明的前景

从华侨喉舌到华人桥梁，东南亚华文报刊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充分昭示，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落地生根是华文报刊的必然归宿。

落地生根，意味着东南亚华文报刊扎根于住在国的土壤，反映着住在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要求，代表着住在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为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当代华文报刊能够生存的前提。

落地生根，意味着从祖籍国传来的种子，在落籍地生根后长出的花果，必然永远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彩，永远散发着中华文化的芳香。这是华文报刊区别于其他报刊的标志，也是华文报刊生命力的源泉。

落地生根，意味着东南亚华文报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前途。处境较顺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报刊，其成功经验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曾遭封禁厄运的印尼、印支等国的华文报刊，近年纷纷复刊的趋势更是有力的例证。

据 1994 年统计，东南亚的华文报刊，马来西亚共有《光华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亚洲时报》等 25 家；新加坡有《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 5 家，泰国有《星暹日报》、《新中原报》、《世界日报》等 7 家；菲律宾有《联合日报》、《世界日报》、《菲华日报》等 5 家；柬埔寨政府 1993 年同时批准《华商日报》、《金边日报》、《高棉独立日报》等 3 家华文报纸出版，近年柬华理事会总会又创办了一家新的华文报纸《柬华日报》。^④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999 年以后，长期枯萎的印尼华文报刊也已开始复苏，多家相继创刊，其中有《呼声》（1999 年 5 月创刊）、《华文邮报》（2000 年 1 月创刊）、《印度尼西亚新生日报》（2000 年 3 月创刊）、《印度尼西亚商报》（2000 年 5 月创刊）、《和平日报》等。^⑤估计目前东南亚约有 60 种以上的华文报刊。

东南亚华人作为已经和正在继续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民族，具有一千多年的移居历史，拥有两千多万人口，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已经并正在继续为住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东南亚华文报刊经历了百年沧桑，也创造了百年辉煌。它像一株百年大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尽管当前还有部分被暴风摧折的枝叶尚未重新抽芽，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整体活力，这株大树依然生机勃勃、信心十足地去迎接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春天！

注 释：

①②④郑文辉：《新加坡华人报业史》，新马出版印刷公司 1973 年版，第 7—10 页；转引自罗汝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早期的华文报》，中山大学《东南亚学刊》第 7 期（1990 年 12 月）。

③⑤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见各该报辞条。

⑥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南洋文摘》8 卷 2 期，转引同①。

⑧⑨慕文整理：《华文报刊今昔》，南宁《八桂侨史》1994 年第 4 期。

⑬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冯自由：《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载《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⑭华金山：《福建华侨史话》，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1983 年 10 月），第 84 页。

⑰⑲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载《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59 页，第 125 页。

⑱宽迪·亚德哇乌猜：《萧佛成——泰国的报人，中国的政治家》，曼谷《中华日报》1992 年 1 月 22 日，第 36 版；转引自张映秋《二十世纪初暹华文化转型期的开端》，中山大学《东南亚学刊》第 13 期（1995 年 6 月）。

㉒洪丝丝：《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载《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6 页。

㉓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2 页。

㉔台北《华侨志·总志》，第 473 页；转引自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出版（1987 年，福州），第 18 页。

⑳据《世界华侨华人辞典》所列统计。

㉑《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 5—8 页，第 418—427 页。

㉒㉓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76 页。

㉔徐安如：《越南华侨爱国报纸〈全民日报〉》，南宁《印支研究》1982 年第 3 期。

㉕㉖㉗㉘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36 页。

㉙黄启文、范柏樟：《〈星洲日报〉编辑出版〈新广西〉及其影响》，南宁《八桂侨史》1991 年第 1 期。

㉚张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北京《光明日报》1986 年 1 月 26 日。

⑳据《世界华侨华人辞典》所载统计。

㉑㉒张俞：《〈棉华日报〉的始末》，南宁《印支研究》1984年第3期。

㉓钟广兴：《印尼华侨报业史》，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11—12页；转引自黄昆章《战后印尼政府的华人文教新闻政策剖析》，载《华侨研究》，广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㉔苏艺：《印尼华侨报业沧桑史》，新加坡《南洋文摘》第4卷第12期，1963年12月1日，第50页；转引自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辞典》。

㉕周南京等编评：《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版，第237—238页。

㉖雅加达《生活版》，1958年12月1日，转引自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辞典》。

㉗此段关于印尼华文报刊的材料，主要引自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辞典》黄昆章文。

㉘温广益：《1966年以来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及其前景展望》，中山大学《东南亚学刊》第7期（1990年12月）。

㉙白灵：《印尼散记》，南宁《八桂侨史》1990年第2期，第18页。

㉚（法国）孙华：《缅怀柬华文化园丁——纪念柬埔寨浩劫十三周年》，香港《华人》，1988年第4期；（法国）犁炎：《柬埔寨华文报业的历史回顾》，香港《华人》，1987年第11期。

㉛㉜㉝转引自方根根：《战后海外华人报刊发展变化刍议》，《华侨历史论丛》第五辑，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1989年5月），第253、254、257页。

㉞㉟转引自袁丁：《印尼华文报刊的复苏》，南宁《八桂侨刊》，2000年第4期，第15页。

㊱㊲邢和平：《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新加坡《源》，第27期。

㊳（马来西亚）陈剑：《马来西亚华团文化复兴运动》，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创刊十周年增刊（1997年），第81页。

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368页。

（作者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士录〕

本刊启事

本刊承蒙各界读者的厚爱，不断获得各方赐稿，在此特向给予本刊大力支持的各位作者致谢。近来，本刊编辑部发现有部分作者一稿多投，给我们的编辑工作造成不少的麻烦。为了进一步办好刊物，现将本刊有关投稿规定再次重申如下：

（一）本刊反对一稿多投。凡投本刊的打印稿件，请在稿件中注明专投本刊字样，以便编辑部考虑，并尽快把处理意见通知作者。

（二）按目前学术期刊通行的做法，对不刊用的稿件一般不退，若作者要求退稿，请附足退稿邮资。来稿字数请限定在1万字以内。

（三）在不违反作者意愿的情况下，编辑部对来稿有权删改，不愿接受删改者，请注明。

本刊编辑部